

新旗

第四期

半月刊 實售國幣三百元

『六二三』的教訓

振聲

『六二三』是一個大成功，但也是一次小失敗。成功的地方在那裏？在於牠表示了民衆的力量；在於牠在爭和平爭民主的總要求下面，團集了極其廣大的羣衆，舉行了一個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未曾有過的大示威。這次示威不限於學生，而且包含着許多工人與職員。這表示出『勝利』以來一向在生活方面從事鬥爭的職工們，已經開始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了。

在團集民衆力量，喚起民衆的政治覺醒，表現民衆爭民主和平的決心這一點上，『六二三』的遊行是一次大成功，大勝利，在未來民衆鬥爭的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這次運動對於爭和平的實際影響上，也是很大的；雖然牠所推出的代表受了毆辱，雖然這些代表受了政府當局的冷待，但是第二次停戰期滿，政府竟『自動』表示願意始終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以及準備禁止的刊物沒有禁止，這不得不說，在很大範圍內，是受了這次運動的影響的。

那末牠的小失敗在那裏呢？在於牠組織的鬆散，在於牠的產生還沒有根據於很廣大的民主基礎。自然，無論那一次示威運動，都帶有很大的自發性，並不是由少數指導者『陰謀』計劃的，所以不能有嚴密的組織。不過至少在運動開始之後，靠着運動中羣衆力量的幫助，是可以，並且應該，走上『一個嚴密的與民主選舉的組織的。因爲羣衆的示威運動，如果不能產生一個組織，沒有一個組織繼其後，那末示威過去，羣衆回家，這一股力量也就散了完了。

，站在卡車上的主席團，曾經提議組織『上海爭取和平聯合會』，但是沒有下文。以致下關代表被毆，上海示威時四位糾察被捕，我們都沒看見有什麼強大的後援。以致在南京，有幾個『難民』與特殊的記者，竟敢企圖否認這些代表的資格。

爭和平爭民主的運動是『方與未艾』，還在開始，而這個鬥爭是長期的，艱巨的。沒有組織的羣衆運動絕對不足以應付這個鬥爭。『六二三』已經給了我們一點教訓，我們應該立刻接受牠。

現在上海的民衆是相當有組織的，工人的產業工會，職工的職業工會，學生會，以及各業公會，都紛紛地成立了。從這些組織中就可以普遍地推舉出代表來，組織一個集中的，統一的，超黨派的，真正代表民衆的爭民主反內戰的代表會議。在可能的時候，這個代表會議也應該包含兵士的與農民的

代表，使牠的基礎更加擴大，勢力更加雄厚。

第四期目錄

- 『六二三』的教訓..... 振聲
- 非律賽果眞獨立了麼？..... 蘭因
- 應有的聲明..... 三男
- 工入與政治..... 舒嚴
- 一個老口號的復活..... 鳳岡
- 動盪中的日本(日本通信)..... 郭淵源
- 革命問題漫談(續)..... 穆德
-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R. Parks
- 工人與農民(讀者通信)..... 羅光勳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 太古船塢李振聲

應有的聲明

三勇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俄國彼得堡由羣衆選舉出來的蘇維埃，發表了一個『財政宣言』。其中有這樣的話：『專制政治從未得到過民衆信任，從未由民衆付託過權力。因之我們決定，我們不答應償付帝國政府與全體民衆公開作戰時所簽訂的一切借款。』

那時候，爲要彌補財政短缺，爲要鎮壓高漲的革命，俄國的沙皇政府向巴黎的財閥借款，所以當時的革命機關彼得堡蘇維埃發表了上面的宣言。

巴黎的財政資本家不理這個宣言，甚至嘲笑這個宣言，竟在牠發表之後數月內，拿七萬五千萬法郎借給俄國皇帝。

過了十二個年頭，俄國革命勝利了，工農政府成立起來，帝國主義者要想叫革命政府擔負過去沙皇政府借來鎮壓革命的錢。蘇維埃政府便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發表了一個命令，宣佈『帝國時代一切債務全部取消。』

帝國主義者無話可說，因爲早在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農羣衆經過他們的代表機關，就對這些有錢人說過：『你們儘管借錢給沙皇好了，反正我們將來不會還的。』誰叫你們不聽忠告的呀！

現在，正當美國華爾街的老板們要把五萬萬美元借給我們的政府，以此『來同全體民衆公開作戰』之時，我們中國的工農們是應該發表一個同樣的『財政宣言』的。

我們應該聲明：祇有由普選產生的全權的國民大會才有權利向外國借款；同時祇有這樣的借款，我們全體民衆才願負償還之責。因爲祇有這樣的國民大會或由這樣的國民大會產生的革命政府，才是『得到民衆信任，並由民衆付託權力』的。

董事長總經理之流。我們自然不反對這些大人先生來參加和平鬥爭，不過我們認爲佔據上海市民，尤其佔據示威羣衆中最大多數的職員與工人羣衆，不應該沒有他們的直接代表。這一點，也表示出我們上面所說的組織上的缺憾，影響到鬥爭的力量。

因此，我們主張：立刻由職工會，學生會，及各業公會（包括自由職業分子的團體），按照各該組織的人數比例，推舉代表，組織一個統一，集中，超黨派的上海各界爭取和平民主的代表會議，由牠來領導我們的鬥爭。

菲律賓果眞獨立了麼？

爾因

今天，除了蘇聯及其若干衛星國外，全世界一切國家都要漸次淪爲美國底殖民地或保護國或『戰略要點』了，而原來做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竟以獨立開。

獨立典禮前三日，新選出的菲律賓總統羅哈斯發表宣言，不僅承認美國有權繼續在菲律賓駐紮海陸空軍，而且『更欲盡非政府之所能，使美國欲在此間建立之陸海空軍永久基地獲得保障。』

我們誠心慶幸菲律賓民族解放和獨立的人，讀了這個宣言，不禁冷了半截。一個獨立國家底領土怎能容許外國來建立海陸空軍永久基地呢？又怎能由國家元首來宣言欲盡其所能以保障這個基地呢？

我們有了這些疑問，便加意研究所謂菲律賓獨立之真相，結果發現美國不僅軍事上繼續統治菲律賓，而且經濟上也繼續統治菲律賓。過去屬於美國人所有的資產，不用說，今後仍舊屬於美國人所有；此外還規定全境天產底開發和利用，連公用事業在內，美國人和菲律賓人有平等的權利，例如馬尼拉電車公司，菲律賓老百姓有錢可以盤下來經營，華爾街老闆們有錢也可盤下來經營，菲律賓老百姓

自然競爭不過萊爾街老闆們的。從今年到一九四五年爲止，美國還給予菲律賓來的貨物以免稅權，一九五四年以後二十年間，關稅才逐漸增加。這就是說今後三十年菲律賓仍將成爲美國底經濟附庸。

菲律賓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沒有獨立的，不過政治上獨立罷了。但軍事上和經濟上沒有獨立的國家，政治上果眞能夠獨立的麼？

不管羅哈斯總統如何宣言『堅欲對美國在菲所行政策表示合作』，如何進一步預許在第三次大戰中『與美國肩膊作戰』，但下層羣衆仍是要求真正的獨立的。我們記得數星期前報紙登載反美遊擊隊在菲律賓活動的消息，我們又知道美國駐菲陸軍近來時刻準備戰鬥行動。每個殖民地，每個被壓迫民族，上層階級底想法與下層階級底想法總是背道而馳的，不僅菲律賓爲然。

我們誠心期望菲律賓民族能完全解放和真正獨立，因此慶祝菲律賓底工人農民及其他被壓迫羣衆繼續努力爲獨立而鬥爭，不僅要得到政治的獨立，而且要得到經濟的和軍事的獨立。

同時，我們爲中國之命運擔憂。中國政治本是獨立的，中國從來未曾將政治的獨立權送給任一外國帝國主義者，如今年七月四日以前的菲律賓那樣。可是抗日戰爭勝利之後，中國經濟漸漸改造要適合於美國底需要了，中國軍隊將完全由美國來配備，來訓練，中國若干戰略要點也將建立美國底海陸空軍基地。換一句話說，中國底經濟獨立和軍事獨立也將漸漸喪失了。中國將漸漸成爲現在獨立後的菲律賓國。

我們既然鼓勵菲律賓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羣衆起來爲菲律賓完全解放和真正獨立而鬥爭，我們更應當自勉，中國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羣衆更應當起來爲求得中國解放或爲保持中國獨立而鬥爭。

人工與政治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中國沉寂多年的工人運動又抬起頭來了。從要求勝利津貼起至此次谷部長和吳市長禁止罷工意中止，這幾個月期間差不多每個工業部門都有鬥爭發生，在此鬥爭中工人大體得到勝利，羣衆性的工會也組織起來，無產階級底團結和力量重新開始爲國人所認識，大家不期然而然地回憶二十年前的五卅運動，——這個工人鬥爭底黃金時代。

舒

拿一九四六年的工人運動和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工人運動相比較，確可做出許多極有意義的結論。我們今天祇要指出一點差異，即二十多年前的運動首先是政治性的，五月三十日屠殺以後的罷工和示威，以及達到最高潮的三次暴動，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政治鬥爭，這將近二年的時間內固然也有經濟性的罷工，但都在共產黨（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工人并不因經濟鬥爭而忘記了政治鬥爭，并不否認有政黨的關係，尤其未曾成立一種『經濟主義』的觀念，認爲工人祇要做到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好，其餘的事情都不要管。

但是此次復興的工人運動，直到最近以前，就與二十年前不同了。工人一般不過問政治，僅以經濟鬥爭爲限，而工會組織者以及工人羣衆自身常常表示不願任何政治黨派來干預工人運動。這種表示，在工會組織者方面也許含有應付環境的作用，但工人羣衆底政治覺悟現在還不及五卅運動時候，則是不可諱言的。

兩次工人運動爲甚麼有這個差異呢？二十年後的運動爲甚麼政治覺悟不及二十年前的呢？原因是很多的，歸納起來約有以下幾點：

第一，五卅時，工人運動是初生之犢，一往直

前，以前雖然有過幾次失敗，受了幾次屠殺，如長沙殺戮（『黃龍』），如京漢路罷工（『二七』），但這些是局部性的，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并未曾實行一個全國性的壓迫。現在則不同了。十九年來工人運動失敗是極其悲慘的，是全國性的，是長時期的。經過這樣失敗以後剛剛抬起頭來的運動，政治覺悟比較落後，本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北洋軍閥時代的中國確實是『非近代的國家』，牠未曾有過應付工人運動底經驗，牠不知道工人運動對於牠的危險性，到了明白這危險性，有了應付經驗時，已經太遲了，牠已經爲國民黨的中國所代替了。現在則不同。工人也許忘記了他們在五卅時代表現的力量，但政府是牢記着的。現在的中國，至少在對付工人運動這一點上，是刮刮叫的『近代國家』，最近代的國家。如此，剛剛抬起頭來的工人運動也就更難於發展政治覺悟了。

第三，五卅前多年中國最進步的智識分子，於工人運動第一次抬頭以前，就已覺悟非工人階級起來干涉政治，中國便沒有出路。他們拋棄戊戌以來智識分子所走的救國道路，而獻身於工人運動。他們組織了『無產階級革命爲旗幟的中國共產黨』，他們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北平大學學生，五四運動領導者，其中最進步的分子，放棄了沒有出路的學生工作，甯可到城外長辛店去，同鐵路工人相處，我們不能否認，京漢路大罷工以及後來上海，廣州，漢口諸大城市的工人運動，是他們一點一滴造成的。現在以前的智識分子，則不同了，人們拋棄工人運動去做學生運動，至多到鄉村去領導農民運動。智識分子根本不知道工人運動底力量和重要性。上海最普遍的最進步的刊物之一公開說：中國建國的二根支柱是農民和智識分子。他們乾脆忘記了工人。在此情形下，工人政治覺悟也要遇着困難的。

難的。

第四，五卅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總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黨，牠的最好的力量放在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裏面，牠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指揮全國工人運動，牠代表着工人力量去參加和領導國民革命，牠又代表着工人力量去發動和領導鄉村農民鬥爭。現在的中國共產黨則不同了。自從革命失敗，工人退出政治舞台後，就放棄城市工作，走到鄉村去，十幾年來無論如何勇敢，如何積聚實力，牠總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黨，而成爲代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黨了。中國沒有一個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黨來領導，這是現在工人運動政治覺悟落後底重要的原因。

但以上四種原因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礙，牠們不過延緩工人底政治覺悟罷了，決不能完全阻止這個覺悟過程。

最近一個月在戰後工人運動上劃了一個段落：一方面資本向勞動反攻，藉口中國工業崩潰應由工資高昂來負責，於是明令禁止罷工意，遂使工人經濟鬥爭趨於沉寂；他方面，工人本身開始覺悟僅僅經濟鬥爭并非出路，必須進一步參加政治鬥爭，於是近來貼政治標語的也有工會具名了，政治鬥爭示威之中也發現工人隊伍了。工人開始走上政治舞台了。

這件事情含有重大意義，是很少人能認識到的，要明白這們意義須先說說工人退出政治舞台後中國如何陷於無出路的狀態。

我們說，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至今，工人就未曾走上政治舞台了。我們知道，許多人聽了這話，一定要抗議的。國民黨說，這十九年來工人始終有工會組織，而各工會每遇重大事件，又都通電或發表宣言擁護國民黨政府，可見工人并未曾停止

其政治的發言。共產黨說，共產黨自身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黨，牠在十九年中不斷鬥爭，成爲中國政治底一個重心，可見工人始終站在政治舞台上。

這些似是而非的議論是必須首先廓清的。我們說工人參加政治，是指工人以階級資格參加之意。工人階級行動是以廣大羣衆集體的行動來表示，至少也當以那眞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行動來表示。這十九年來，我們都知道，中國工人從未以廣大羣衆集體的行動來提出他們的政治主張。至於組織，則悲慘得很。革命期間成立的眞能代表工人的職業性工會，失敗後，或者消滅了；或者被殺了；或者亡命了，或者消極了，或者背叛了；工會驅散起初還存在，由警備司令部派人來『整理』，後來根本不要道組織，祇留下若干上層機關。十九年長期中，工人偶然也有自發的鬥爭，隨着鬥爭需要偶然也有真正工會的組織，可是不不要妄想這組織能擴大，能持久，人們嚴密監視着，到了一定界限就要來『整理』或取締的。

政黨怎樣呢？中國共產黨，不錯，在革命期間是代表工人的黨；革命失敗後最初三四年也會努力留在城市做地底下工作，組織和領導秘密的紅色工會，以從事於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可是由於城市白色恐怖劇烈和農村武裝力量開展，共產黨就拋棄城市工作，拋棄工人，而全力到農村去領導農民了。無論是自願的或被迫的，中國共產黨從此不是代表工人的黨，而是代表農民的黨了。

中國各大城市工人羣衆，既無工會組織，又無政黨領導，因此化爲各個『原子』，成了一盤散沙。中國工人階級存在，但牠在政治上的表現等於零。不僅別人無視工人底政治力量，工人自己也卑視自己。在經濟地位說，他是工人，但在政治意見，在感情，在思想各方面說，他則還原爲他出身的階

級，即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我們試拿八年抗戰來說。這不僅是十九年中一件大事，而且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個別的工人，以國民一分子資格，參加抗戰，不畏犧牲，演成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是中國工人并未曾以階級資格對抗戰發言，并未曾站在階級立場對抗戰表示意見。美國新聞記者斯諾在他著的『爲亞細亞之戰』中明白說出，八一三戰爭時上海工人階級一般是冷淡的，不然上海工廠機器早可以完全搬到內地去了。鄭韜齋在他著的『抗戰以來』中，說兵士如何勇敢，農民如何爲保衛鄉土而怕犧牲，華僑如何奔赴祖國視死如歸，但根本沒有提到工人。這二個觀察家是以深刻而忠實著名的。他們的報導自然可靠。但我們切勿以爲工人不愛國。工人以國民一分子資格是盡了愛國責任的。他們解消於其他人羣之中。兵士，農民，華僑，都含有工人在內。但他們未曾以工人階級資格團結一致行動，他們執仗禦侮，但未曾以工人階級資格想想，搬移那將要失陷的工廠設備，對於工人階級自身有甚麼意義。

此次聯合國抵抗軸心國侵略者的戰爭，據我們所知，除了中國之外，各國工人都是以階級資格參加的，不僅以國民資格參加的。戰爭前，這些國家還有羣衆的工會存在，社會黨和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仍是以工人爲基礎的黨，工人以直接的羣衆行動或通過其組織，始終干預國家底政治。各國政局所以明朗，中國政局所以混沌，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倘使當初中國工人是以階級資格對於抗戰採取立場的，則中國政政勝利所用的方法將完全兩樣，而戰後中國問題也將容易解決，至少也將有明顯的路向放在全國人民的面前了。

由此可見，工人階級退出政治舞台，不僅是工人自身底不幸，而且是整個國家底不幸了。

過去的事情祇好讓它過去了。重要的是現在和未來。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究竟是一個甚麼局面呢？右派怎樣說，我們不去管牠，左派一致地說：現在是民主和反民主之間的鬥爭。這話，現在深入於一般民衆（連工人在內）意識之中。但如此籠統的說法，正是工人階級沒有政治發言的一種表現呀！我們甯願換一種說法，說：現在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反對賴美國帝國主義的官僚資本之獨裁統治，資產階級之中的反對派，所謂『民族資本』，則在利用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力量，爲的向美國和官僚資本索取若干讓步，以說到相當時候將叛這個民主運動。我們這種赤裸裸的說法是人們所不喜歡的，因爲除去工人以外，人們喜歡一些超階級的辭句，如『民主』之類。

但是決定歷史方向的，不是超階級的辭句，而是真實的力量對比。中國政治局面如果長久留爲城鄉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則確實是沒有出路的。因爲二十年來的歷史證明資產階級決不能解決中國問題；而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無論人數如何衆多，如何受壓迫，如何憤慨，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底殘餘，都不能代表一個更進步的社會形式。如此鬥爭下去，整個社會都要陷於崩潰，而從灰燼之中決不能新生甚麼出來的。

所以必須有第三者走上政治舞台。這第三者決不是界於國共之間的民主同盟，也不是界於官僚資本和城鄉小資產階級之間的所謂『民族資本』，而是中國無產階級。

中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台，首先是加入現在的民主運動。但那時，『民主』就不是籠統的超階級的辭句了，而是含有一定的內容，提出具體的要求，明顯帶着階級性質。那時中國政局將明顯表現爲：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對官僚資本以及整個資產階級的鬥爭了。無產階級將領導而且完成民主運動。那時不僅現今的內戰可以解決，整個中國也一定有出路了。

工人，爲了自己，爲了國家，都應當毅然決然踏上政治舞台！

舊思想在崩潰中

動盪中的日本

(日本通信)

郭溫源

記者按，由於地理，歷史種種關係，日本和中國始終是息息相關的，研究和認識日本，現在仍是中國重要的課題。郭溫源先生把近來日本被壓迫羣衆底鬥爭動態寫給我們，不僅本刊引爲榮幸，中國在鬥爭中的羣衆和將加入鬥爭的羣衆也是極表歡迎的，本期我們先發表這第一篇通信，其中側重於羣衆思想解放方面。下期，第二篇通信將告訴我們日本工農如何鬥爭，以及最近轟動世界的日本工人管理工廠之真相。

大戰爭之後，往往隨伴着革命運動的高潮，這是歷史昭示我們的事實。這一方面由於物質的大量破壞，使人民的生活困苦萬分，因而不得不起來鬥爭，另一方面也由於戰爭削弱了統治階級的力量，遂至狼烟四起，顧了這裏，顧不了那裏。我們只看這次戰後各國政府怎樣手忙腳亂的謀『善後』就可以知道。救濟糧荒，救濟失業，允許民族獨立等方法，配合着武力的壓迫，無非是要把革命的火焰撲滅下去。各帝國主義者之間雖然存在着許多矛盾，但是在防止革命這一點上是自然合作的。

日本也不能例外，日本帝國主義雖不是資本主義中最弱的一環，但是由於處於戰敗國地位的關係，各種矛盾必然要爆發得更加利害。如果不是聰明的美國當局一方面在派大兵鎮壓，一方面在使日本『民主化』，日本民衆的反抗運動或許更要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一般人對於戰後日本能保持表面平靜都非常感覺奇怪，日本果真是平靜的嗎？決不是的。這表面上的一時平靜一方面是由於消息的

一個老口號的復活

鳳岡

二十九年，即當一九一七年初，那時候正打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其中有一個參加國，即俄羅斯帝國，內部首先出了亂子。兵士們不肯打仗，工人要罷工，一般的市民吵麵包，鄉下的農民嚷着要土地。因爲那時候的俄國，是由一個皇帝統治着的。他的政府專制得很，一點民主都沒有。他爲了資本家的利益，把成千成萬的農民與工人送到戰場上去當炮灰；爲了地主的利益，始終壓迫着農民做奴隸，使他們得不到土地；又爲了那些投機家的利益，讓這些人拿民衆的生活品來賺錢，弄得糧價飛漲，民不聊生。結果，這些民衆反抗起來，大家來反對沙皇政府，提出了一個有名的普遍的口號，那就是：『和平，麵包，土地。』

在這個口號之下，兵士們爬上火車回家來了，民衆搶奪麵包，農民們自動手分了地主的土地。這三種人的上面又加上一種工人，他們贊成這三個要求，領導他們，把他們分散的鬥爭聯合起來，首先去打擊皇帝的專制政府。專制政府本來靠人民的愚忠來維持的，現在既然大家反了，牠的基礎動搖了，很快便倒了下來。有名的『二月革命』成功了。

不過皇帝下了台，爬上台去的不是工人兵士農民，而是一些投機的資本家，還有幾個出賣工人利益的工賊，幾個自稱爲農民代表的政客。這三派人組織了『聯合政府』。這個『聯合政府』自然做不出好事情來的。他們名義上很革命，說話很漂亮，但是做起事來，却跟沙皇政府差不多。民衆受了他們一個時候的欺騙，立刻就明白過來了。因爲民衆的知識雖然不及那些政客，但他們一經起來，要騙他們也很不容易。他們不問你說得是否漂亮，祇問你是否做到了他們的要求。他們推倒了皇帝，因爲皇帝不給他們和平，不給他們麵包，不給他們土地。現在，皇帝雖然下台了，政府雖然號稱民主了，但是他們的三個基本要求沒有達到，他們無論如何不會滿意，不會承認牠是他們自己的政府。他們仍舊堅持着要求：和平，麵包，土地。

『聯合政府』想了許多法子，用愛國的名義，用革命的名義，想叫人民放棄這幾個要求。牠要兵士繼續爲『祖國』，其實是爲資本家，流血；牠要人民拉緊褲帶，共渡難關；要農民不要拿取土地，且等『立憲會議解決了再說』；更要工人安心生產，不要領導農民和兵士搗亂，不要干涉工廠行政（那時工人主張工人監督生產）。這些話都沒有用，不管資本家，工賊和假農民的『聯合政府』改組再改組，他們只是要達到自己的要求，只是要和平，麵包，土地。

最後，他們對『革命政府』的信仰一點點失光了。他們完全擁護一個真能解決他們問題的工人政黨，即布爾雪維克黨，幫助這個黨在工人兵士的代表會議裏，就是所謂『蘇維埃』裏，佔據了多數，並且在這個布爾雪維克的蘇維埃的領導之下，去打倒了資本家的『聯合政府』，成立蘇維埃政府。這就是所謂十月革命。

蘇維埃政府在牠的成立大會上，就是在『全俄國蘇維埃大會』上，就解決了兩個迫切要求。牠公佈了

欲對領，另一方面也由於戰敗國的心理在作祟。事實上，日本的黨派鬥爭和革命運動現在正在蓬勃發展，已漸有燎原之勢。

日本黨派鬥爭所以澎湃的原因，主要有三點：(一)因戰爭消耗，人民生活極度貧困，加以戰敗後國外市場資源地被奪，日僑全部被遷送，更使經濟恐慌加甚。(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本來先天不足，其所以能與英美競爭，一方面由於資本較為集中，靠獨占和國家化增加了力量，另一方面靠利用封建的忠君愛國思想，麻醉了人民。但是一經戰敗，舊思想的麻醉必然要大大失去效用。(三)日本農大衆在戰前就有相當的鬥爭訓練。雖然在十幾年來受到極度的壓迫，但是一旦反動的統治力量削弱，以舊有的經驗，重新再起，當然是比較容易的。

日本舊統治的動搖首先表現在一般國民的思想情緒方面。雖然千百年養成的舊觀念舊習慣一時不易完全改變，但日本人心正在發生變動乃是毫無疑問的。我說舊統治動搖當然不是說日本舊勢力馬上就會垮台，而是說它無論如何再不能成爲有效的統治方式了。有若干現象在從前是絕不會發生的，現在居然也發生了。例如天皇，在日本人眼中，從前看得比神還要尊貴。對於神，人們可以公開表示不信任，對於天皇，人們却不敢提出一點疑問。但是現在在怎樣了呢？固然對日本國內人民及對上海日本僑民作民意調查所得的結果知道多數日本人仍舊不贊成廢除君主制，但是對於天皇的神性却敢取出來作爲問題了。在目前正在開會的日本議會中，甚至比較右傾的政黨也在追問新憲草中的『主權在民』作何解釋，追問『男女平等』是否適用於皇位繼承，追問皇族的特權是否取消。在幾次的人民鬥爭中，人民的代表一直闖進皇宮，要求面會天皇。例如：

『無賄款，不侵略的民主和平』，宣佈了『土地法令』；『天之後，地又傾倒了』，反投機令，保證了民衆的糧食。這三項命令不假公佈，而且切實執行，所以大大地得到了全體勞動人民的擁護。

這個故事就是一九一七年俄國工農革命的經過。雖然內中情形還複雜得多，雖然鬥爭的要求並不止這三個。不過從當時革命的直接原因看，從最廣大的下層羣衆的意識看，我們可以說，這是三個要求觸發了二月革命，推倒了皇帝；這是三個要求打擊着資本家政府，使他一再跌倒；也是這三個要求幫助了布爾雪維克黨獲得羣衆，最後奪取了政權。布爾雪維克黨所以能够保持政權，打退最兇惡的反革命，主要也就靠因爲能够解決這三個要求。

X

X

X

X

二十九年後的今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連接打起來的內戰，在中國造成了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和當時俄羅斯所存在的沒有什麼大不同。相同的情形，便發生了相同的要求。『和平，糧食，土地』，現在也成了中國勞動大衆的普遍要求了。

我們的和平鬥爭

目前我們中國的和平鬥爭，無論在範圍的廣大和性質的深刻上說，都超過了當時的俄國。俄國那時候所打的是對外的戰爭，所以，雖然大多數的兵士不肯打了，很多農民工人都反對了戰爭，可是愛國思想還很有力量，社會的中上層不必說，便是好多的工農份子，尤其是他們的政治上的代表們，一想到和平會換來最屈服的條件，他們就動搖了，又擁護起戰爭來。在一切反皇帝的革命黨中，能够堅決而一貫地主張和平的，祇有布爾雪維克黨。中國現在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對外戰爭早已沒有了，正在打的是內戰，甚至還不是內戰，而是一個執政黨對另一個反對黨的討伐戰，甚至還不是一國之內的討伐戰，而是明顯地由一個外國在策動，在幫忙的。這個外國的企圖，是要在策動這個討伐戰的過程中，獲得特殊的權益，並準備未來對另一個大國作戰的基礎。這樣的一種戰爭，不僅威脅着最大多數民衆的生存，違反着他們的利益，而且還危害着民族獨立的利益，所以又反對了一部份人的愛國思想的。因之，在目前中國，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是大大地超過了俄國當年的反戰人數。包括着更多的人，更多的階級。現在，我們可以說，除了執政黨及其少數擁護者之外，全中國的老百姓，沒有一個不反對戰爭——內戰——的。

再就性質上說，這個反戰鬥爭，也比俄國當年的來得深刻。在俄國，人們只是消極地不願意再打，充其量，不過是不願意再替資本家與協約國流血吧了。可是目前中國，雖然最大多數人也只是要求一個能够安居樂業的和平，但也有相當數目的人，他們的和平要求，是含有反對執政黨進攻比較進步的武力，反對進攻武裝民衆之意的。我們中國民衆的和平，又含有反對國外帝國主義者干涉內政，乘機漁利的意義。最後，這鬥爭又含有反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意義。因爲目前中國的內戰，事實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即美國進攻蘇聯大戰的序幕，是極其顯明的。

因此，我們的和平鬥爭，至少在客觀上，含有三個意義，也可以說三種性質：一，反對代表財政買辦資本與地主利益的政府進攻代表農民利益的勢力；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操縱中國內政，破壞中國主權；

五月十二日東京世田谷區區民舉行大會，參加者約千餘人，狂呼饑餓，宣言糧食應由人民管理，……樹立人民共和國政府，……會後分頭遊行示威，其中一隊百十三人由共黨若田英一率領擁至宮城門前……遂高揭赤旗入宮城，創日本史上未有之例。羣衆既入宮，要求參觀日皇餐室……謂非天皇之餐室，窮詰不已，始悉爲職員膳堂，衆乃譁然……

五月十七日共黨議員德田，志賀等五人認吉田組閣天皇應負責任，乃相率入宮質問，爲官警所阻，交涉結果，卒得入門，……見總務科長稱求見日皇，科長答謂：『今日不能見』，志賀詰之曰：『天皇嘗謂欲出巡各處，與人民接觸，今人民有事求見，反予拒絕何也？』科長答曰：『會見一事，係一大政治問題，官內省不能傳達。』德田曰：『天皇無政治責任乎？』答曰：『由大臣輔弱負責。』……志賀曰：『天皇詔曰「朕與爾等偕」，而不令我等會見侍從長或宮內大臣，何偕之有？』德田怒曰：『人民飢餓，天皇不知之乎？人民房屋盡燬，而御林獨擁材木，何以不伐木造屋？獨擁如此財產何用？赤坂離宮，所居惟皇太后一人，何以不開放？如此可謂與人民偕乎？』……

皇宮前面的廣場現在簡直變成羣衆的會場。例如五一節的羣衆大會，五月十九日的五月糧食節羣衆大會，五月十九日的全國教員大會，都是在宮城前開的。

對於天皇尙且如是，則對於內閣以下的官吏更可想而知。人民對於自己不滿意的內閣，可以公然喊出『打倒』，公開說他『反動』，當局也毫沒有辦法。如果是在中國，你罵我『反動』我也可以罵你『反動』，……『反動』與『正動』鬧得是非不

三，反對美帝國國主義在中國準備『橋頭堡』，拿中國作戰場，進行第三次大戰，用原子彈來毀滅中國與中國的民衆。

就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爭和平鬥爭絕對不是（也不能是）表示消極的安居樂業，必須是積極的，向上述的三個方向進行。換句話說，她不能祇要求表面和平的獲得，而必須進一步反對進行戰爭的政府，反對內戰策動者的美國，反對正由美國策劃中的第三次大戰。因爲，不從根本上去反對第三次大戰，不從根本上去反對戰爭的根源——資本帝國主義，不從根本上去剷除這個根源，那末中國的內戰不會避免，戰爭不會避免，老百姓也就永遠不能安居樂業的。

如此說來，中國民衆的反內戰運動，必須和世界的反戰運動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必須和世界革命聯繫起來。因爲唯一有效的反戰鬥爭，就是革命鬥爭。

我們的糧食鬥爭

說起糧食恐慌，目前我們的和當年俄國的比較起來，那是壞得更多了。俄國人大喊『麵包！』的時候，白麵包祇漲了百分之三百倍。我們呢？拿上海來說吧，白米一石，打仗之前是十元，現在賣六萬元，就是說：漲了百分之六十萬倍！價錢貴還不算，有些地方，甚至有了錢買不到米。現在據外國人給我們作的一個粗疏的估計，中國有十九省發生饑荒，三千萬人沒有飯吃。這情形，在二十九年前的俄羅斯，那是完全不知道的。俄國那時候的麵包恐慌，主要原因是投機囤積，壯丁激減。我們呢？這兩個原因都有，只是在壞的程度上，還要厲害到幾十倍。我們這兒的糧食投機不限於商人，而是官商合作的；我們這兒的壯丁激發不是公平攤派，而是專採貧苦無告人家的子弟，就是專採那些力能種田的農民子弟，網羅以去的。除此之外，又加上日本軍閥幾年來的蹂躪摧殘，中國軍閥特有的搶劫勒索；中國政府的橫征暴斂，土匪流寇的敲劫剝掠，地主的轉嫁與剝削，富農高利貸者的兇惡盤剝，最後，再加上意外的天災人禍，結果弄成功目前那幅中國農村慘不忍睹的景象。

我們的糧食問題，也就是饑荒問題，真是太嚴重了，嚴重的程度，簡直和俄國革命時候不可同日而語。要解決這個問題，把希望寄託在聯合國救濟署身上是顯然不夠的。發動全國善心人去救濟更是不夠的。簡單下道命令去反對投機也無用，因爲命令必須由一個權力來實行，而我們的當權者恰好就是投機者自己。那末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第一，當然要和平，要這樣才能停止搶『買』軍米，停止徵實；而且還能把成千成萬農村中的壯丁放回來，讓他們耕種田地；第二，要建立一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的權力機關，就是說，要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解決一切迫切的與根本的問題，好像：組織農民委員會，實行農民的自治與自衛，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廢棄一切軍事徭役，經由農民委員會辦理急救，反對地主富農的投機囤積，高利盤剝，由政府低利貸款貸糧，並且供給工具耕牛，而最主要的，應該根本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由此一勞永逸地解決糧食問題，避免饑荒發生。

如此看來，中國的糧食問題，不僅是一個救災問題，也不僅是反對投機問題；極密切地與和平問題不可分開，與政治的民主化問題不可分開，而最主要的，她與又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可分開。因此我們要談到『土地』這個要求。

滯。俄國在日本，反動的當層却只嫌厚薄臉臉，不至在賜給了的時候，學學小丑，像幣原似的，聲嘶他並不反動而因鬥爭的業業包圍官廳，包圍政府要人，更更趨趨在在。

(二)三月四日千葉縣農民代表訪首相申訴農民痛苦，提出要求，其一是現內閣之總辭職。

(三)四月七日民主主義諸團體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人民大會』，參加者七萬餘人。各黨代表相繼演說，強調打倒幣原內閣，由人民自身製定憲法。：：散會後舉行示威，擁至首相官邸，與警察發生衝突，負傷三十餘人，並發生開鎗事件。

(四)五月糧食節(另見)後，代表德田等赴首相官邸，求見吉田，因吉田不見，代表團是晚即宿官邸，：：在官邸堅守二十八小時之久。

(五)五月廿二日教員聯合會代表約七十人往訪田中文相，質問十九日所提：：要求如何辦理：：按該代表團自十九日住宿文部省以來已經四日：：並擬於下月一日召開全國大會，在此期間，以文部省會議室為辦事處。

由以上所述，約略日本官廳的舊威嚴掃地是可以知道的了。比官廳之失去威嚴更值得注意的事是軍紀的破壞和『師道』的動搖。日本的軍紀是世界聞名的。那怕官位只差一級，都必須絕對服從。在戰爭中，由於長官的命令，日本軍隊作盲目犧牲的不知該有多少。可是那樣犧牲仍舊吃了收仗，士兵心裏當然是非常憤懣的。於是舊日的軍紀維持不住了。最近『復員船』上發生的一件士兵審判官長的事，在現代日本歷史上可以說是找不着前例的。

過去日本軍官對待下級士兵素甚暴戾，：：然

我們們的土門爭

中國是農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務農的，所以許多人都歡喜說這樣的證：我們是以農業立國。但是，說來慚愧，自從對外通商以來，我們每年巨大的入超數字中，不但有農產品，而且，我們的主要食糧——米——愈來愈佔了重要的地位。這是什麼原因？難道說，這三十年來中國的人口生得太快，所以本國生產的米糧，不夠維持了嗎？顯然不是的。這幾種原因，中國人即使那大表地減少，也決不會末肉地增加的。不斷的戰爭，不斷的災，再加上種種眼看不見的經濟的壓迫，中國農民是苦不堪言。這原因使中國這個農業國家養活不了自己的人口呢？如果真是因為米過剩，當然是因為供不應求。這句話說，多少年來中國的糧食缺乏，不是因為吃的人太多，倒是因為生產的米更少了。為什麼會少起來呢？當然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為什麼會破產？那末這兒的原因是很多的，主要的說，有外來的，有內在的。外來的有如：帝國主義侵入後，農業手工業的破壞，外國農產物之競爭，中國農產物之受世界市場的支配與決定，再加上本國政府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富農的種種非經濟性的剝削。內在的，則首先由於中國土地制度的愈來愈不合理。

中國土地制度的不合理，首先在於地所有權的過分集中，使用權的過分分散。這是農業經濟的一個致命的病根。俄國人喊着『土地！土地！』的時候，問題的嚴重，還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程度。俄國當年，所有權是集中的，就是說，土地操在少數大地主手裏，但使用權也是相當集中的，就是說，耕種的面積單位相當大。所以農業的生產力雖然低，但還不致於養不活自己的人口，而且還有餘產輸出國外。中國現在的問題却不同。所有權方面，據一個比較可靠的統計說：占全體百分之四十四的貧苦農民，領有土地百分之六；而僅占全體農業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却領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這是一種多麼不公平的分配。講到使用方面，事情則更是壞到極點，據美國人替我們做的調查，中國的農戶平均一家為六、二的人，平均耕種四、一八畝土地。非但自耕農的耕種面積小得怕人，就是向地主借地耕種的佃農，因為資本，人力與農具的缺乏，也是小得可憐。這種情形是最不利於生產力的。

美國人的農戶平均一家為四、二人，平均耕種一百五十七英畝土地。這個對照，使中美二國的農業生產力也大不相同：在中國，一畝稻田的種植需要九十三個勞動日，在美國，祇要三天！

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分配與土地經營，結果使我們這個產米國家，在豐收之年，也必須從外國輸入四十萬噸的米糧；倘若一有災，情形就壞到不可收拾了。例如在去年度，因為十幾省的災人禍，以致我們必須向外國購買七百七十萬噸大米才能養得活全國人民。這時候，政府又忙於打內戰，根本想不到這件事上，不但想不到，而且還不顧死活地搶軍米；至於遼寧，安南等地的餘米呢？則因英國封鎖，運輸困難，有錢也買不到，你看，怎麼會使我們的三千萬饑民不靠『觀音土』，樹皮，草根來充飢呢？

如此看來，假使不根本改變中國的土門爭，中國的飢荒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不過有人會想，假使所有權集中着，但把使用權集中起來，利用最新技術，實行大規模耕種，不是可以解決糧食問題，饑荒問題，乃至土地問題嗎？這是一個單相思的如意算盤。不用說，照國內與國際的情勢看來，中國產生不出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的地主階級，也不能產生一些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家。因此，想在集中的所有權的基礎上

我們們的土門爭

中國是農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務農的，所以許多人都歡喜說這樣的證：我們是以農業立國。但是，說來慚愧，自從對外通商以來，我們每年巨大的入超數字中，不但有農產品，而且，我們的主要食糧——米——愈來愈佔了重要的地位。這是什麼原因？難道說，這三十年來中國的人口生得太快，所以本國生產的米糧，不夠維持了嗎？顯然不是的。這幾種原因，中國人即使那大表地減少，也決不會末肉地增加的。不斷的戰爭，不斷的災，再加上種種眼看不見的經濟的壓迫，中國農民是苦不堪言。這原因使中國這個農業國家養活不了自己的人口呢？如果真是因為米過剩，當然是因為供不應求。這句話說，多少年來中國的糧食缺乏，不是因為吃的人太多，倒是因為生產的米更少了。為什麼會少起來呢？當然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為什麼會破產？那末這兒的原因是很多的，主要的說，有外來的，有內在的。外來的有如：帝國主義侵入後，農業手工業的破壞，外國農產物之競爭，中國農產物之受世界市場的支配與決定，再加上本國政府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富農的種種非經濟性的剝削。內在的，則首先由於中國土地制度的愈來愈不合理。

中國土地制度的不合理，首先在於地所有權的過分集中，使用權的過分分散。這是農業經濟的一個致命的病根。俄國人喊着『土地！土地！』的時候，問題的嚴重，還沒有達到我們現在的程度。俄國當年，所有權是集中的，就是說，土地操在少數大地主手裏，但使用權也是相當集中的，就是說，耕種的面積單位相當大。所以農業的生產力雖然低，但還不致於養不活自己的人口，而且還有餘產輸出國外。中國現在的問題却不同。所有權方面，據一個比較可靠的統計說：占全體百分之四十四的貧苦農民，領有土地百分之六；而僅占全體農業人口百分之五的大地主却領有土地百分之四十三。這是一種多麼不公平的分配。講到使用方面，事情則更是壞到極點，據美國人替我們做的調查，中國的農戶平均一家為六、二的人，平均耕種四、一八畝土地。非但自耕農的耕種面積小得怕人，就是向地主借地耕種的佃農，因為資本，人力與農具的缺乏，也是小得可憐。這種情形是最不利於生產力的。

美國人的農戶平均一家為四、二人，平均耕種一百五十七英畝土地。這個對照，使中美二國的農業生產力也大不相同：在中國，一畝稻田的種植需要九十三個勞動日，在美國，祇要三天！

這種不合理的土地分配與土地經營，結果使我們這個產米國家，在豐收之年，也必須從外國輸入四十萬噸的米糧；倘若一有災，情形就壞到不可收拾了。例如在去年度，因為十幾省的災人禍，以致我們必須向外國購買七百七十萬噸大米才能養得活全國人民。這時候，政府又忙於打內戰，根本想不到這件事上，不但想不到，而且還不顧死活地搶軍米；至於遼寧，安南等地的餘米呢？則因英國封鎖，運輸困難，有錢也買不到，你看，怎麼會使我們的三千萬饑民不靠『觀音土』，樹皮，草根來充飢呢？

如此看來，假使不根本改變中國的土門爭，中國的飢荒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不過有人會想，假使所有權集中着，但把使用權集中起來，利用最新技術，實行大規模耕種，不是可以解決糧食問題，饑荒問題，乃至土地問題嗎？這是一個單相思的如意算盤。不用說，照國內與國際的情勢看來，中國產生不出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的地主階級，也不能產生一些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家。因此，想在集中的所有權的基礎上

被押擊之憤激終於由盤谷返日本之辰春丸船上暴發。該船裝載日俘三千五百人，本擬直駛博多不意途中發生士兵審判官長事件，船長無法維持秩序，不得已遂中途改變方向，投較近之鹿兒島港靠岸，求助於鹿兒島警察，始將肇事者逮捕。緣該士兵等平時受官長之斥責虐待，極為痛苦，物質待遇又極不均，回國乘船時須為官長搬運行李，宛如奴隸，鬱憤終於船上爆發，士兵將各將校呼出甲板上，令其依次坐下，口稱『戰犯審判』，檢查彼等行李，投入海中，繼以軍鞋皮帶逐一毆打，致毆傷軍官達三十餘人。有一軍官因受辱過甚竟投海自殺。師道的尊嚴也是日本維持舊統治的條件之一。平時學校風潮極少。小學生對於教師更加為馴服。小學生罷課反對先生，在日本是史無前例的。現在有如下的事：

福岡市高官國民學校學生三十名，於五月廿四日起實行罷課。其起因為訓育主任毆打學生及校園中糞蔬不配給學生所致。學校當局於罷課發生後極感狼狽，當即訪問學生家長道歉，力勸到校上課，並向各學生配給葱十五斤。風潮始告平熄。

小學生都能罷課，大學生當然更不能再受拘束了。隨着民主化的高潮，和麥帥肅清戰犯的訓令，學校的民主化運動和肅清反動教授的運動都普遍發展着，關於肅清黷武主義者，並不完全要一等待麥帥總部來摘發，往往是學生自動來甄別。在中國是學校當局甄別學生，在日本則是學生甄別學校當局。反動的教授被逼退休，從前因思想問題而被政府撤職的現在都重新復職。而歷來自由空氣最濃厚的早稻田大學現在仍站在革新運動的最前面。

五月廿九日早稻田大學學生委員會召開大會，通

進行集中的大規模經營，只是一個夢想，而且是反動的夢想。因為，萬一在帝國主義直接幫助之下，或經過他的代理人，想進行這樣的集中經營，第一個結果便是：使用土地的最大多數農民，將被逼離土地，成為佃戶或者遊民；小規模的自耕農將被逼失去土地，被強迫以低價賣給『公司』。第二，中外合作的大規模的農業企業，必然會被設計成帝國主義國工業原料的簡單供給者，這樣，非但無補於中國農業經濟的更生與發展，而且是大有害的。

如此看來，要點在集中的地主所有權的基礎上，進行集中的經營，乃是不可能的；如果在帝國主義的幫助之下（例如目前在設計中的中美農業合作）部分地推進這種過程，那末非但不能解決目前的農村恐慌，而且還要加深恐慌，使中國的最大多數農民陷進更加悲慘的境地中去。

因之，要想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與農業問題，除了治標的停戰，取消苛雜減租減息，農民組織與自衛之外，頂頂重要的一個治本辦法，就是第一要把過分集中的地主所有權，分散為農民所有權。就是說，要把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祇有當每一個種田的農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保證了他們每年耕種出來的東西，除了一小部應繳合理的公糧之外，都歸他們自己所有，中國的農村經濟才能興盛起來。如此分配出來的耕地，雖然還是小塊的，但比之現在情形却要好得多了。據專家計算，如果把全國耕地平均分配於全體農戶，每一戶可得二五畝，這比目前的四·一八畝要大得多了。祇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談得到技術改良與科學方法的農業。

自然，中國的貧農是連這點淺近知識都不知道的，他們並不是從思想上規定自己的行動，而是那實在挨不下去的飢餓生活，難以負担的公糧地租與利息，難以忍受的種種屈辱與壓迫，尤其是那些不勞而獲的地主富農高利貸者的富裕生活，給了他們一個難堪的對照，他們便沒命地起來了，起來反對這一切，打倒這所有的人，而在這鬥爭中，首先的一件事當然是要奪取土地。

現在中國的農業恐慌，不但客觀的分析告訴了我們必須將土地分給貧苦農民，而且農民的實際生活，也已經養成了他們的主觀意識，必須去奪取土地了，這樣情形，和二十九年前的俄國，也是十分相像的。

俄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這樣看來，目前中國廣大羣衆的幾個迫切要求，已和二十九年前的俄國一樣了，那末為什麼還不造成同樣的故事呢？這因為，一種要求之客觀上的存在和牠主觀上的爭取，中間還橫着一個距離。中國的老百姓，固然都感覺到和平，糧食與土地的需要，但直到現在，至少還沒有大規模為此等要求的實現而鬥爭。為和平的鬥爭做得比較廣泛的，但還限於一些社會的中上層，尤其叫得響的已一部分工業家，知識份子與學生，真正能決定和戰戰兢兢的兵士大眾，除了極少數之外，祇是心無鬥志而已，却還不會放下槍來，更談不到向後轉了。其他的兩種要求，也未見有大規模的行動。為什麼會如此的呢？據上面所說，這些要求甚至都比俄國當年的更加深刻，那為什麼反而遲遲不炸呢？這兒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幫助，是牠，給我們的『壞政府』（見美國『時代』週刊）帶來了『勝利』，是牠，替我們這將潰的武力打了強心針；是牠，替我們這實際崩潰的經濟維持了最後一道防堤；是牠，使我們這瀕於絕境的糧食飢荒來了微弱的緩和。這些『勝利』『強心針』『最後防堤』『緩和』拖着這腐爛透心的反動政制的生命，延緩着二十九

過濶濶戰犯教授，強化教授陣容，學費由國庫補助，公開學校行政內幕等向校方提出交涉。

早稻田大學為求改革大學組織，實行民主化起見，定六月十日選舉校長，選舉由教授，助教授，校友代表及職員中選出之選舉人九十名舉行。

君主日本的大學校長依民主原則選出，而民主中國的學校反常為黨棍包辦，真是大大的諷刺。

和教育有關的還有書籍。日本現在查禁的並不是有危險思想的『紅色刊物』，反是有侵略思想的刊物。因而社會科學一類東西又暢銷起來：

日本在慘敗後灰色生活中，可供慰藉者，僅有電影與書籍，書籍生意，始終不衰，言論出版解放後，書籍雜誌之多，如雨後春筍。目前社會科學書籍銷路最佳，『共產黨宣言』，『工資勞動與資本』，『價值價格與利潤』，『馬克斯』等，銷行如飛，……

日本思想的變動也可以由統計數字更明顯表示出來。這裏有兩種統計是很有意思的。第一種統計數字是日本各黨派的勢力消長。在戰後舉行的衆議院議員選舉中，日本社會黨一躍而為三大黨之一，日本共產黨也得了五個議席，這和戰前相比真要說是異常的進步了。戰前，在極端壓迫之下，普通人談起共產黨來都諱莫如深。而目前共產黨居然可以公開參加選舉，是誰也未會想到的。選舉結果各派黨選人數如次：

自由黨	一三九	共產黨	五
社會黨	九二	諸小派	三八
進步黨	九一	無所屬	八三
協同黨	一六	共計	四六四

共產黨在議會裏的勢力雖不大，然而在羣衆中的影響並不足以從議席數上看出來。今年二月二十

年前那個俄羅斯故事的重演。不過延緩決非避免之謂，用強心針鉗着的殘餘生命，祇能使人脫氣時更加快些吧了。

同樣的情形，多半會構造同樣的故事的，遲早些吧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如果事情祇限於這樣自發的原始狀態，那也還是成不了什麼事的。水蒸氣如果引導進蒸氣機，只能化成一陣輕雲，飛散了。革命運動蒸氣機是革命的組織，首先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組織。在目前的中國，正應着一句老話：『萬事俱備，祇欠東風』，這東風便是工人階級的革命的領導。現在讓我們再回到那個老故事去吧：二十九年以前俄國羣衆的和平，麵包，土地的要求，是在彼得格拉工人階級鬥爭的推動與領導之下，才匯成爲革命的怒潮的。工人階級竭力擁護這三個要求，將他們看成自己的，同時，他們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又提出了『全民族』的要求；他們要求工人監督生產，他們要求全權普選的國民大會來實行政治的革命。更重要的，他們在自己的鬥爭中，成立了戰鬥組織，根據最民主的原則，包括了最大多數的勞動羣衆，建立了蘇維埃。由這個組織，不僅團結了自己，又團結了城市的全體下層羣衆，又團結了兵士，最後又團結了農民。這樣，蘇維埃成了『和平，麵包，土地』這個口號的組織上的體現者了。牠促成了革命的勝利。

但俄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得這樣好的。在最初，蘇維埃中有多數代表，不能堅決擁護這些要求，他們或者完全反對這些要求，或者祇贊成一部分。他們反對和平，尤其反對將土地交給農民。蘇維埃中的許多政黨，祇有布爾雪維克黨是始終一貫擁護這全部要求，而且把這些要求匯合起來，締結到更高的政權要求的。所以，祇當工人階級在其戰鬥組織完全受着列甯的布爾雪維克黨領導之後，俄國人當年的『和平，麵包，土地』的鬥爭，才發展到了深刻的革命運動而最後獲得成功。

這教訓，我們中國的工人階級的革命者是必須記在心頭的。究竟二十九年以前這個俄羅斯羣衆的老口號，能否在目前的中國造成一個新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看我們能否接受和實行這個教訓。

五日，共產黨在東京公開舉行第五次大會，出席黨員約千名。據當時統計，全國黨員總數爲六千八百四十七名。較三個月前增加七倍餘。黨機關報發行約達三十萬份。

還有兩個統計，如果比較着看，倒可以發見很有趣的事實。一個是上海改造日報對一般日僑做的民意測驗，一個是東京慶應大學對若干工廠工人做的民意測驗。這兩個測驗舉行的日期都在今年三月。兩個測驗對象既不同，則提出的問題自然也不會完全一樣。但是也有若干問題是雙方共通的。現在拿來比較一下：

主張維持現狀者		主張改革者	
男 四四%	女 四四%	男 五〇%	女 八〇%
贊成共濟會者		贊成爲反對之兩倍半	
男 二一%	女 三〇%	男 三〇%	女 二〇%

由此可知工人社會意識比較一般市民社會意識更趨向變革方面。以上不過說明日本舊思想的崩潰罷了，至於農羣衆底實際鬥爭，則留待下篇敘述。

革命問題漫談(續)

穆德

五

以上的中國革命觀，即把中國革命定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性質，——乃是我們獨有的革命觀，與其他黨派所主張的不同。其他黨派雖然各有各的革命觀，但牠們中間有個共同點，即牠們一致認為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在這共同點之下自然有許多分歧之點，可是正如各黨各派(除我們以外)以國民和共產兩大黨為中軸結合起來一般，各種革命觀(除我們的以外)也是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的。第一類是國民黨所主張的，牠認為這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當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後造成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社會。至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將來怎樣呢？則國民黨理論家意見不一致，有些人對此問題簡直沒有興趣，有些人承認將來總要實現「禮運」上說的大同社會，但那是遙遠得很，或如國民黨元老吳敬恆最近說的，須待二萬萬年以後。第二類是共產黨所主張的，牠認為與先進國歷史相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由資產階級單獨領導，須由無產階級參加領導，但革命後造成的仍是資本主義社會，或「新資本主義社會」。至於這個「新資本主義社會」將來怎樣呢？則共產黨理論家有一致的意見，認為這不過是革命底「第一階段」，將來要發展到「第二階段」，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那時就可以造成社會主義社會。這第一階段的時間是「相當的長」，但不會遙遠至二萬萬年以後。其他黨派底革命觀雖然各有各的特點，但大體不出於這兩大類範圍。這裏必須聲明一點，即我們以上所說，是就各黨派底理論說的，而非就牠們的實踐說的。

我們先來檢討國民黨底革命觀。我們剛才說國民黨認為中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為了造成資本主義社會。國民黨理論家聽到了一定會起來抗議，他們說，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屬於全民的革命，或國民革命，而不是甚麼資產階級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全體國民來領導革命的，而不是代表甚麼資產階級，至於革命後，則國民黨要建立的是一民主主義的中國，而不是甚麼資本主義社會，因為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固然是先進國資產階級革命底要求，但民主主義即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并非資本主義呀！不錯，不錯，國民黨理論家先生！你們是這般說的。但是我們一向主張以真名稱呼實物，主張將各階級各黨派底要求，企圖和理論翻譯為馬克思主義語言。

甚麼叫做「全民的」呢？照馬克思主義說，自有文字的歷史以來，人類社會就分化為階級，各階級間互相鬥爭，祇有階級的利益可言，而沒有甚麼全民的利益可言，說到革命，則尤其祇有階級的而沒有甚麼全民的。中國革命也是如此。現在擺在中國面前的，首先是如何解除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和政治的束縛，如何消滅過去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把生產力解放出來。這首先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倘若中國革命僅限於此，則此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而不是甚麼「全民」性的。但如我們所認識的，中國革命必然要不斷發展下去，直至推翻資本主義本身，那時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性的了。所以無論在甚麼情形下，我們祇祇有階級的革命，而沒有「全民的」革命。

國民黨自始至終不承認牠代表資產階級。但這沒有甚麼奇怪之處。歷史上有個資產階級政黨自認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麼？沒有！祇有無產階級政黨能够自認代表無產階級利益；至於資產階級政黨，則古今中外都是自認為代表全體人類或全體國民利益的，都是否認代表某一特定階級利益的。在以前，資本主義上昇時代，確有資產階級政黨除了代表一階級底利益以外，兼能代表所有受封建制度壓迫剝削的階級底利益。但國民黨出現得太晚了，資本主義已經到衰落時代了，此時無產階級已經有了自覺，曉得提出自己的階級利益去對抗資產階級利益，那麼國民黨祇能代表資產階級利益了。從前執政以來二十年間的行爲就是事實的證明。

所謂三民主義，徹頭徹尾是資本主義底要求。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不用說；民主主義即使能够實現，充其量也不過「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二項而已。僅僅節制資本而非消滅資本，僅僅平均地權而非國有土地，那麼仍舊是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國民黨所理想的大同社會如果仍是三民主義的，那麼牠的理想就未曾超出資本主義範圍，——何況這還不是國民黨能够實現的理想。

國民黨底革命觀，無論自己說的如何好聽，翻成馬克思主義語言之後，就祇有「中國資產階級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造成中國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簡單的意義了。這本是各先進國資產階級底革命觀，國民黨照抄來罷了。除了俄國以外，各先進國都曾實現這個革命觀，至於中國，則同俄國一樣，這個革命觀是不能實現的。

爲甚麼呢？

首先，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得到成功，是不能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歷史上，各先進國資產階級革命都是發生於和完成於資本主義上昇時代，那時資本主義還有活力，還有前途，還有進步意義，而無產階級還沒有團結，還

沒有明白的階級自覺，祇能贊助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生產關係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便在資本主義底下積聚力量，為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之用。到了俄國就不然了。二十世紀初年俄國革命，照歷史類比說，雖屬資產階級民主性質，但此時已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即資本主義衰落時代，社會主義已經成熟了，俄國無產階級已能團結，有自覺，可以奪取和執掌政權了，資產階級遂退縮，害怕，不敢領導革命至於完成。他方面，俄國資產階級投了許多資本在土地上，反對農民佔有土地，因之甯願與地主階級聯合去壓迫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正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中心任務，所以資產階級也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完成。於是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權遂落於無產階級肩上了。

中國革命時代處的更晚，不僅在世界戰爭以後，而且在世界革命第一潮以後，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成立以後。中國無產階級也已能團結，有自覺了，一九二五——二七年歷史就是證據。中國資產階級也退縮，害怕，不敢領導革命至於完成。他方面，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心任務，除了土地改革之外，還有民族獨立，但中國資產階級不僅投資於土地，與地主結不解緣，而且

中國革命悲劇(續)

第二章 中國革命問題

中國社會變革來得很晚，為此之故中國今天才會充滿了那麼多的矛盾和對照。被一種全世界制度所迫，中國不得不從鐵犁一躍而至拽引機，從肩與一躍而至飛機。帝國主義強迫『天朝大邦』到一個凡俗的世界中來找尋牠的位置，而這個世界，無論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已經遠遠超過牠的前面去了。中國沒有可能按部就班前進，沒有可能從頭走過其餘世界早已走過的那些歷史發展階段。要跟得上其餘的世界，就必須向前大跳一步。西方需用幾百年時間來完成的變化，中國則須於幾十年內完成之。如此急步直追，必然要造成最猛烈的震動。最近三十年來中國發生的事變所有帶着沸騰，疾迅，廣闊，淵深，爆炸的性質，就是為了這個原故。

中國如果要把握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提高至新時代迫切要求的水準線上，則不僅必須卸除牠的過去，而且必須改造牠的現在。舊的枷鎖和新的枷鎖，二者都是必須打破的。帝國主義侵入，帶來了生產，交通和金融上最新式的技術，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具。帝國主義者為了利用中國商人，地主，官僚和軍閥，便幫

受帝國主義那裏，仰帝國主義鼻息，與帝國主義結不解緣，不能領導革命至於完成。於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權也不能不落於無產階級肩上了。其次，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祇能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中順帶完成。

最後，因為中國革命後再不能建立資本主義，祇能同世界革命合流以建立社會主義了。

但這兩個問題，不僅關涉於國民黨革命觀批評，而且關涉於共產黨革命觀批評，我們留待下章再說。

總之，姑假定國民黨是要革命的，是要把中國改造為資本主義強國如美，英，及戰前德，法，意，日諸國一樣的，但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容許中國實現這種革命了。實際上，國民黨不朝革命方向走了；對外，牠祇想如何改造中國，使之適應於美國財政資本之需要；對內，牠祇想如何保持現存的土地制度，如何繼續一黨專政，如何剝奪人民所有的基本的權利和自由。牠已經從革命的黨變而為革命底對象了。(未完)

Harold B. Isaacs 著
唐 威 譯

助保持中國社會組織底前資本主義形式。外國人開辦的工廠，外國人興辦的鐵路，被利用來從那尚在支配整個中國的落後關係中榨取超額利潤。帝國主義者佔據了中國經濟上一切戰略要點，又從中榨取利益貢獻於海外投資者以後，固然也要獨立發展中國底資源以相當提高中國人民生活水準。可是中國人民如果從貧困被提高到豐足初步，則生產力就必須解除其一切束縛。土地必須歸還耕者，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操縱必須打破。這些在中國革命問題中是不可分離的原素。們自然不能在中國一國範圍內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在現代世界經濟條件之下，一國問題不能再從整個世界問題分別出來解決了。中國所負歷史使命底性質，註定了，要解決牠的問題，就要立即與帝國主義列強發生直接衝突。如此決定了中國社會衝突和政治衝突底國際性。中國社會改革不過是全世界社會改革之中一個因素罷了。同時，中國也已變成這個世界底一部分了，變成各種勢力之世界規模的活動和鬥爭中間一個重大元素了。中國國內危機之發展及其最後解決，必然有極重要的，也許有決定性的影響，遠出於牠的國境以外。

革命若不首先歸還農民以土地及其勞動產物，則中國經濟生活是談不上甚

變根本改革的。唯有走這條道路，中國才能摧毀其舊式的土地所有制。沒有這一個不可避免的第一步驟，則要改變農村經濟的新形式，要用新方法來增加農業生產力，都是不可想像的。中國人口中四分之三或三萬萬以上的人，都是依賴土地為生的。這幾萬萬人民問題，就是中國底問題。他們的貧窮就是中國底貧窮。中國未來的希望，就在於能將這廣大羣衆底無限的生產潛能解放出來。他們今天的貧窮，是由於一種社會制度作祟，牠從他們手裏奪去了他們從土地得來的產物，又奪去了土地自身，却沒有拿甚麼報償他們。

中國農村經濟有下列幾個重要特點：(一)土地所有權愈來愈迅速集中於一部分人手裏，這部分人數又一天比一天減少了；(二)土地契據好多落入於那些離鄉地主，政府官吏，銀行和城市資本家之手，他們經過地方商人和高利貸者操縱着那深入最遙遠鄉村的商業資本，但他們自己又是受外國財政資本和世界市場所操縱和支配的；(三)農業生產節節和衰落，因為土地愈分愈細，最落後的耕種方法保存不變，地主，高利貸者和國家殘酷榨取，而水旱災荒和內戰又時常降臨，——內戰雙方軍隊就是那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所組成和擴大的。

近來，人們才第一次進行了合格的科學的調查，才最後打破了那種很普通的認為中國是相當安逸的小農之國的幻想。陳翰笙教授根據他指導的研究工作，估計農民中至少百分之六五是有土地的或土地不足的，即雖有土地，但分得太細，沿用落後的生產方法，又受重重榨取，不能過着飽暖的生活。自有土地和佃耕土地之差別，自己勞動和雇用勞動之差別，遂將全體農民深深區分為富農，中農，貧農三個範疇。

農村中階級關係可以從土地分配條件看得出來。據一九一七年一種官方估計，中國農民百分之五五是完全沒有土地的，百分之二〇雖有土地但不夠過活，可耕種的土地中百分之八一集中於農村人口內百分之二三之手。以上的統計，大體上被後來實地調查的人所證實了。在個人地主佔優勢的北方，以一縣為標準研究結果，雖然無土地的佃農僅佔農村居民中百分之五，但其他百分之七〇祇佔有全體耕地之三〇以下，每個耕種單位平均約一〇·九畝，即不及二英畝。另一縣研究，則發現農村居民中百分之六五·二祇佔有百分之二五·九的土地，每個耕種單位不及七華畝，即一英畝多些。地主和富農合併佔農村居民中百分之二一·七，所有土地則佔百分之二三，其他的土地歸中農所有。

在人口更稠密得多的長江流域及南方諸省，首先感受帝國主義影響，因之

農業更多商業化的地方，則土地不均現象更加顯著些。在浙江一縣裏，調查者發現農村居民中百分之三佔有土地達百分之八〇。在無錫縣，農戶中百分之六八·九僅佔有百分之四·二的土地，耕種單位平均祇有一·四華畝，即不及一英畝之四分之一。地主和富農合併佔據農戶中百分之二一·三，但佔有百分之六五的土地。

廣東省分別的研究，發現，省內各區農村居民中有土地的約佔百分之二至三二，佃農和雇農約佔百分之六八至八八。在某區貧農佔農村居民中百分之六四·三，調查者發現其中百分之六〇·四是沒有土地的。各縣研究平均看來，農村人口中一半以上是沒有土地的。貧農所耕種的全部土地，祇有百分之七·二是自己的，其餘百分之八二·八則是佃來的。貧農自有的土地，每戶平均為八·七華畝；耕種的土地，連佃來的在內，則平均為五·七華畝。農民每戶最低生活所需要的土地，各縣不同，從六畝至十畝；佃農所需要的則加倍。土地如此集中，一部分是由於以前屬於國家，廟宇或團體的大量土地漸漸變為私有了，族姓公有的大量土地也為少數有勢力的族長所私佔。農業生產底不斷低落和農民負擔底不斷增加，不久就使得農民拋棄其剩剩的土地了。無論他如何勤巧，他在那小塊土地上總比賽不過他國農業上的科學進步的，總沒有方法奈何他的日減一日的土地生產力的。中國底主要輸出品，茶和絲，在世界市場上失敗了，因為別國更有效率地生產了更好的物品。

國家整個的落後，適應現代市場需要的交通工具底缺乏，農民所用方法底陳舊不變，——這些配合起來，當商業資本深入內地而廉價的機器製品同潮水一般湧來打破了舊時自給自足的狀態時候，便使農業生產者陷於破產了。農民要維持生存，就不能不為市場而生產，但是他的土地太小，他的方法又太陳舊，沒有辦法生產得更多些。他不僅不能多生產一點去出賣以應需要，而且必須借債，為了購買肥料，種子，農具，及青黃不接時候的糧食。為了借債，他必須拿他的土地去抵押，利率總是在百分之三〇以上，有時百分之六〇，七〇，八〇，甚至更高些。捐稅底繁重，軍閥底謀求，使他欠債更多，使他本人和他的土地更加受高利貸者和收稅吏所自由擺布。商人可以隨意剝削他，因為他不能將他的微小物品運到遙遠的市場去。糧食被人壟斷了，價格隨人規定了。農民一年勞動結果，祇有增加債務，而沒有甚麼積蓄可言。債務年年跟着他，他死了以後又跟着他的子孫。他失去土地之後就成了佃農。佃農必須將一年收穫百分之四〇至七〇交納田主，此外還須呈送禮物以及過去封建時代傳下的陋規，連某種情形之下義務的勞動在內。水旱蝗災，他是無法抵抗的，他的收穫

，他的土地（如果他還有土地），他的家產，他自己的生命，常常為此而喪失，即使年成好，他的生活也不過是不致餓死罷了。他不過是地主，收稅吏，商人和高利貸者底奴隸罷了。

上述的過程，以其種種形態，使得廣大的農民羣衆陷入於慢性的無可解救的貧困之中。幾百萬人失去了土地，求乞，挨餓，當兵，做土匪。南方的人航海到美洲，南洋羣島和印度去了。北方的人則去滿洲，那裏有未開發的土地。幾百萬人擁擠在沿江沿海諸城市裏，構成了廉價勞動力底無限泉源，為新工業所不能吸收的。他們的勞動比畜牲還便宜些。在中國，從東至西，從南至北，人做着畜牲的工作。土地漸漸沒有人耕種了。中國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之一，到此不得不從外國輸入糧食，而且一年比一年輸入更多的糧食。國內的和國外的市場一天天縮小。整個經濟機構從根爛了。

這種種條件表示，解放土地以爲生產之用（這就是解放農民，卸除其負擔之意）乃是凡想復興中國經濟所不能不走的的第一步了。但要解放土地，又必須同時整個國家經濟能自由發展，國家資源能配合國家需要。在現存的帝國主義經濟的和政治的特權沒有傷損之下，上述事情是永遠不可能的。外國資本在一切重要經濟部門佔據了支配地位，同吸血鬼一般吸盡中國底資源。中國最大的工業，棉紗業，外國資本將近佔有一半。牠佔有三分之一鐵路，其餘的鐵路又抵押給牠。中國內河航業，牠佔有了一半以上；沿海和對外貿易，有百分之八〇是由外國輪船裝載的。帝國主義者有了優越的技術，有了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權，便把中國榨乾了。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全部入超達到驚人的總數一·五〇〇·〇〇〇元美金；以後十年更增加一倍。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四年，外國投資加了一倍；以後十五年又加一倍，共達三·三〇〇·〇〇〇元美金。其中五分之四以上是直接投放在交通和工業的，其餘則爲借款形式，使得中國政府變成帝國主義者底奉順工具，讓帝國主義者能够操縱國家內外的收入。

中國要能自由支配自己的生產力，就必須奪回這個已失的陣地。牠必須禁止各國勢力範圍所培植的軍閥間的不斷戰爭和衝突而統一起來。惟有這樣，才能恢復國內和平，消滅軍閥專橫，擴張和發展國內市場。惟有這樣，中國工業才能成爲提高全體羣衆生活水平線的基础。要解放土地生產力，中國必須從帝國主義底下解放出來。要從帝國主義底下解放出來，中國又必須給廣大農民羣衆以能解除其不可忍受的重壓的希望，使之能够行動起來。一種反帝國主義運動，旗幟上民族解放口號旁邊寫着土地革命口號，才能獲得力量使帝國主義

者廢除。怎樣做這運動呢？誰來做這運動呢？要回答這問題，就須估量各階級底力量

和關係，因爲各階級對於土地和對於帝國主義的關係是各不相同的。每個階級必然是懷抱着不同的目標走上政治鬥爭道路。農民，包含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在內，在政治舞台上沒有獨立的作用，這是歷史所充分證明了的。農民之間深刻分化爲許多層次，其經濟利益是互相劇烈衝突的。農民，在經濟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是狹隘的，局限的。爲了這些原故，鄉村總是跟着城市走。農民總是受那個城市階級所領導的，牠能集中，能團結，能監督，能指揮。鄉村經濟必然以城市爲中心圍繞起來，沒有這個城市向心力，農民是束手無策的，最貧窮的，最受剝削的，最接近土地的農民，尤其束手無策。農民若是沒有城市階級來援助或不信任城市階級而圖謀自己改善自己的命運，那麼他們必然要採取孤獨的暴力形式，而得不到出路。

當初俄國就是這樣，現在中國尤其是這樣。中國有如此廣大的領土，如此衆多的人口，幾萬萬人貧窮，不識字，迷信，他們的風俗，習慣，語言又是如此差異的，不僅此省和彼省不同，此城和彼城不同，甚至此村和彼村也不同。歷代農民大戰爭，毫無例外地都終結於農民內部的分化，因爲暴動的農民總是被一部分統治階級利用去的，這部分統治階級，不是要建立新的社會，而是要建立新的皇朝。戰爭打過了以後，一個新皇帝就坐在龍座上，而地主們又拾起頭來了。惟有城市同盟者才能改變一切社會關係，才能完全摧毀舊的國家而在其廢墟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才能解放農民脫離這個走馬燈般的發展道路，使之不受鄉村中少數人所剝削，而在鄉村和城市間建立一個文化的橋樑。

在歐洲，二百年前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履行了這個解放農民的歷史使命。新興的資本家必須把資產階級財產制擴張到土地上去，必須把勞動從農奴制解放出來而入於新興農業下的工錢奴隸制。小資產階級中最澈底的部分走上前來幫助農民破除封建的束縛，并建立強大的資產階級同族國家之基礎。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則因於中國特殊條件和資產階級通過生長之故，資產階級自己不能解放農民，因爲由於中國特殊條件和資產階級通過生長之故，資產階級自己是直接剝削農民的。我們已經知道中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生長起來的，牠不是獨立的城市集團，而是從舊統治階級之中產生出來的，牠現在還經過千百條線索與前資本主義的或半封建的土地剝削制聯繫起來，牠直接參加了這個剝削制。農民成了地主，高利貸者，商人，銀行家，軍閥，收稅吏，地方官吏等人搶劫的對象。這些剝削者底利益互相結合而構成爲統治階級。常常是一個人，既收田租

，又收利息，既收捐稅，又收封建貢品。

陳翰笙教授寫道：『與法國舊制度下的地主完全不同，中國地主常常是四位一體的。他們一面收田租，一面營商業，一面放高利，一面做官員。好多放重利的地主變成營商業的地主，好多營商業的地主變成官商兼做的地主。同時，好多商人和官吏也變成了地主。地主常常開辦糖坊，油榨，糧食店。他方面，商店老闆也常常接受土地抵押，最後做了土地主人。大家都知道，地主開的當舖和商店總是這樣或那樣依附於文武官廳所有的銀行。……雖然祇有幾個大地主以放高利為其主要事業，但差不多所有地主都與高利貸有關係。此外，好多地主兼任文官或軍官。』

這就是中國統治階級及其剝削農民制度真面目。這種制度底根本關係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典型的封建制度，早於幾百年前，當基本的生產機關——即土地，成為可以買賣的時候，就已消滅了。商業資本侵入農村，在那保持許多多前資本主義形態的一種經濟結構內部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剝削形式。今日的資產者，即官——商——收稅吏——高利貸者的地主，其收入是從市場投機，國家捐稅，高利貸，土地抵押和地租等方面得來的。他們本身是中國經濟落後性底一種產物，又從社會結構中留存的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得到不少的利益。他們依靠那在性質上和來源上屬於封建制度的方法去榨取利益，例如軍事徵發，修役，貢品，實物地租，強迫勞動，軍事服役，地方雜稅，厘金等等。

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工業階級中重要部分變成買辦了，他們替外國資本或受外國人監督的資本効勞，正如軍閥及其政府變成帝國主義棋盤中的走卒一個樣。有野心的中國工業家和銀行家，希望本國有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也要帝國主義者底鐵手放鬆一點，但是他們很快就明白：他們和本國被剝削羣衆間的距離，是比較他們和外國競爭者間的距離，更加深遠，更加不可調和的。他們還有許多地方依賴於外國競爭者哩。資產階級能夠努力，而且確實努力，從帝國主義爭得讓步。要求而且獲得了較大部分的贖品，但他們自己是不能向羣衆讓步直至能使羣衆感覺滿意的，因為如此，他們就要損壞自己根基了。土地是不能歸還農民的，因為歸還之後，一切現存的財產關係就要破壞，而城鄉資產階級底經濟基礎就要摧毀了。這個基本事實註定了中外剝削者一致聯合去反對被剝削者。牠也說明了中國革命任務底解決為甚麼落入於最新的最幼稚的階級，城市無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組織着和率領着城市和鄉村幾萬萬勞苦的農民和工匠。惟有無產階級利益能與整個中國經濟生活之澈底改造相一致的。

在全國廣大人口中佔極小數的無產階級能够負起政治領導責任，——這一點已經不是理論了，已經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成為事實，成為革命勝利的一個條件了。那裏，一個落後國底無產階級履行了破產的資產階級所不能担負的任務。十月革命證明了：無產階級暴動（新的階級矛盾之尖峯）和農民戰爭（舊的階級矛盾之殘存）相配合才能替落後國家在現代帝國主義世界中開闢一條出路。同俄國一般，中國也須解決那歷史上屬於資產階級革命過去時代的任務。俄國已經證明了，要在二十世紀解決這個任務，祇有澈底改變一切階級關係和整個社會機構。這是配合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的。

十月革命經驗，對於整個落後的東方，尤其對於中國，含有決定性的意義。過去資產階級革命發生於資本主義早期，於無產階級未曾出現為一個獨立的階級以前。雖然如此，那些革命仍須依賴庶民羣衆堅決的參加才能成功的。荷蘭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鬥爭了一百年，為的解除西班牙封建主義的壓迫，為的替荷蘭資產階級經濟擴張清除道路。英國資產階級國家底基礎是克林威爾軍隊中那些工匠和農民所建立的。在法國，這個模範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國，農民暴動嚇得第三等級中那些市民倒退到貴族懷抱中去。城市庶民，長褲黨，無產階級先驅者，三番四次從巴黎農會席中起來，推動革命前進。最後粉碎封建鎖練和解放農民的，并非一七八九年的『國民會議』，而是一七九三年的雅可賓共和國，——雖然後來農民又陷入於新的資產階級奴隸制中，為資產階級社會一個構成部分。

在上述那些革命和後來的俄國革命中間，有一個歷史時代橫隔着，這時代深深改變了整個社會，因之也改變了社會變革所用的手段和方法。資本主義建立了世界規模的分工制。技術的進步和財富的增長，如此迅速，不久就與民族藩籬相抵觸了，民族籬籬本是為了促進內部市場之改組和生產制度之發展而設立的。各民族間為了爭奪市場，原料產地，廉價勞動和較高利潤，而互相爭鬥着。如此爭鬥結果生長了殖民地帝國。世界所有落後的部分都屈服於若干較前進的國家，都不得被牽入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軌道之中。亞洲和非洲成了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大鬥爭舞台。由於這個迅速發展過程所必然帶來的殘酷競爭遂發生了財富集中傾向，遂興起了大工業生產的壟斷，而整個世界遂為數量日減勢力日大的經濟政治集團所分割了。（未完）

譯者按，本書者為力求忠實起見，凡引用材料都註明出處，以致有遺麼多的小註。從本期起，我們把這些小註刪去了，讓正文能够多登載一點。將來有機會印行單行本時，再將小註添入。

記者先生：

以非常興奮的心情，讀完了第一期『新旗』，心裏實在忍不住要寫點感想，寄給貴刊。

正如你們在發刊辭裏所說一樣，『目前刊物太多，但也可說太少。』歌功頌德，為統治者宣揚『聖教』的那些東西，祇能令人發嘔，『便是那些進步方面的，不也祇是在一些相當空洞的要求旁邊打轉，替現成的勢力說話麼？』掛着代表全體人民的招牌的刊物不能算少，但是這些正如一個國家一樣，雖然任你說得怎樣逼真，這個國家是全體人民的，是謀整個人民的福利的；但實質上卻總不是這麼一回事，牠必然祇是屬於一部分人的，代表的祇是一個階級的利益。所以直到現在，真能為中國最大多數勞苦大眾發言的刊物，簡直還沒有看見。現在貴刊竟毅然揭起了大旗，為佔着絕對大多數的勞動階級發言，怎能不使人欣喜。勞動階級如果要改善生活，要徹底解放，就必須有個獨立的刊物，堅定地一貫地，說他們所要說的話。

自從『勝利』以來，最令人頭痛的是所謂『東北事件』。無可諱言的，統治者利用東北事件來玩他們的把戲，但是正像貴刊所說，這個事件決不是純粹的內政問題，其帶有國際意義是毫無疑問的。這裏牽涉着美國與蘇聯。美國不必說，牠本是帝國主義者。蘇聯，則一向被吾人視作革命的象徵，代表着正義；但牠在這裏執行的政策，卻不能不令人失望，可以說牠給了我們這些寄全部熱情和信心於蘇聯的人，以一個致命的打擊。我知道有許多許多

的人正在為這件事痛心苦悶，甚至消沈悲觀，因為蘇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辯護牠這種醜惡的『要求恢復沙皇時代特權』的舉動。也許牠會說，這完全出於軍事的需要，為了維護本身的安全。但老實說罷，馬克思早就說過，把軍事需要作為決定國界的原則，難道不是盲目與時代錯誤麼？

蘇聯在財產國有這一點上，還保持着十月革命的遺產，所以我們總是愛護牠的，但那種錯誤舉動，我們卻不能不加以反對。貴刊這種堅強的獨立的精神，我覺得是絕對正確的。

在資本家及其擁護者強調着勞資合作的時候，能够在這裏看到二篇立論正確的關於罷工問題的文章，也是可喜的事。罷工乃是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的唯一武器！

對於長久消沈，長久受壓迫的工人們，我們必須常常指示他們：工人階級的利益是永遠與他們的敵對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處在相反的地位。不但要說『適當的勞動要有適當的工資』，還應當進一步指出『廢除工資制度』的遠景，因為這不僅是情緒上或道德上的問題，而是歷史必然的途徑。

關於中國農民的問題，貴刊似未曾提到，殊覺未當，因為對於在同一戰線上的農民，我們是不應忽視的。同時，農民受了客觀條件所限制，階級意識發展較差，故應當特別加以強調。草草寫了這些，以表示對貴刊的一點敬意。

光勳先生：
本刊出版後，蒙先生第一人來信指教，并加以鼓勵，甚感。尤其令我們興奮的，即是先生贊同我們的基本立場，我們對於東北問題的見解，以及我們為工人利益所說的話。

正如發刊辭所說的，現在站在工人立場上說話的刊物實在太多了。即使有二三種刊物也能寫些文章指導工人目前的鬥爭，為工人底要求作辯護，但關於工人底歷史使命，關於未來大事變中工人應佔的地位，關於來信所說的『廢除工資制度』問題，則除了本刊之外，是沒有人說的。可是我們認為後者和前者是同樣重要的，是必需互相配合的。

本刊初辦，缺點還是很多，我們希望先生及其他讀者多多指正。我們學習着，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務使本刊愈少缺點愈好。缺少關於農民運動的文字，自然也是本刊缺點之一。從本期起，我們開始糾正了。『一個老口號的復活』文中提到了土地問題，『中國革命悲劇』中恰好談到農民問題。我們歡迎讀者將各地農民底痛苦和鬥爭寫給本刊發表。我們相信，在未來大事變中，中國農民將發揮巨大的力量。現在替農民說話的刊物并非沒有，而且比替工人說話的還多些，但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都是一面過低估量農民的力量，一面過高估量農民的政治獨立性。根據先進國歷史經驗看來，農民無論具有如何巨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必須在某一城市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發揮出來的。在未來大事變中，中國農民必須受城市工人領導，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這是我們對於農民運動的見解。

三十五年六月五日羅光勳